

# 日本学界“陈嘉庚镜像”的演变论析

任江辉

(集美大学 外国语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 日本学界的陈嘉庚研究大致萌芽于日本对东南亚华侨华人的调查研究过程中。由于研究立场和军国主义的影响, 早期日本学界的陈嘉庚研究呈现出明显的主观性和政治性。随着二战的结束, 其研究的客观性、系统性也逐步体现出来, 形成了日本学界特有的“陈嘉庚镜像”, 具有其自身鲜明的特点。日本学界的陈嘉庚研究的学术内涵和外延丰富, 具有独特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

[关键词] 陈嘉庚研究; 陈嘉庚镜像; 日本学界

[中图分类号] K 828. 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 (2022) 01-0016-08

## 一、引言

陈嘉庚是杰出华侨领袖, 他对中国的革命、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也对东南亚的经济、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华侨旗帜”的精神领袖, 陈嘉庚在全世界的华侨华人中树立了爱国主义的典范。因此, 在研究华侨华人这一学术领域中, 陈嘉庚尤其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从研究成果的地域特点观之, 陈嘉庚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 (1) 陈嘉庚出生地、生活地学界的研究, 如中国学界、新加坡学界、马来西亚学界的研究。该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论著和学术论文,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有: 杨国桢的《陈嘉庚》<sup>[1]</sup>、陈碧笙和陈毅明编著的《陈嘉庚年谱》<sup>[2]</sup>、林少川的《陈嘉庚与南侨技工》<sup>[3]</sup>等; 比较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有: 林德时的《论嘉庚精神的基本内涵》<sup>[4]</sup>和《嘉庚精神: 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宝贵资源》<sup>[5]</sup>、郭玉聪的《教育救国: 陈嘉庚倾资兴学的思想动机》<sup>[6]</sup>、潘懋元的《教育事业家陈嘉庚教育思想新探》<sup>[7]</sup>等。(2) 非陈嘉庚出生地、生活地如日本、韩国、美国、英国等学界的研究, 其中日本学界的研究就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与中国学界

的研究立场和角度相比, 日本学界的研究者大多居于不同的视域、不同的立场来分析和评价陈嘉庚, 逐步建构起颇具特色的“陈嘉庚镜像”, 呈现出其特有的评论和阐释, 从而形成了陈嘉庚研究的外延, 是对陈嘉庚研究内涵的重要参考和补充。

## 二、日本学界“陈嘉庚镜像”的研究变化

陈嘉庚研究在日本学界发端于日本对东南亚华侨的调查和研究的过程中。“1907年, 日本政府批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帝国国防方针》, 确定了向亚洲大陆扩张国权和扶持民力向南洋发展的基本国策。从此, 日本政府有关机构和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东亚经济调查局、台湾拓殖株式会社等一批‘国策会社’开始对南洋华侨的历史与现状进行长期和全面的调查研究”<sup>[8]</sup>。在这一历史语境下, 日本立足于“南进政策”入侵东南亚, 并在对东南亚进行详尽的调查过程中逐步涉及当时的“华侨领袖”陈嘉庚的研究。从1945年前日本学界深受日本军国主义的影响、其调查和研究的价值取向的特点以及陈嘉庚研究在日本学界的历史发展内涵观之,

[收稿日期] 2021-06-21

[基金项目]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基金项目 (H2018135)

[作者简介] 任江辉 (1979—), 男, 福建泉州人, 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华侨华人、日本学与日本近现代文学研究。

大致可以将二战结束（即1945年）作为时间节点，日本学界的陈嘉庚研究可分为二战结束前和二战结束后两个历史发展分期。

### （一）二战结束前日本学界的陈嘉庚研究

二战结束前日本学界对陈嘉庚的调查和研究，其成果主要体现在日本企划院编写的《华侨之研究》<sup>[9]</sup>、“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编写的《南洋华侨丛书》<sup>[10]</sup>、井出季和太的《南洋与华侨》<sup>[11]</sup>、根岸佶的《华侨杂记》<sup>[12]</sup>等论著上。

1. 1939年日本企划院编写的《华侨之研究》，详细阐释了陈嘉庚在支援抗日活动中的影响和作用。（1）分析了陈嘉庚在马来西亚乃至整个东南亚华侨社会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声望。（2）论述了陈嘉庚所经营的企业虽然遭受当时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经济亏损严重，但是其影响力依然渗透着整个东南亚华侨社会。（3）分析了陈嘉庚举办南洋华侨代表大会，担任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以下简称“南侨总会”）主席，积极支援抗日的状况，进而解析了陈嘉庚创办《南洋商报》是具有宣传抗日之目的。

2. 1941年“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编写的《南洋华侨丛书》出版发行，这一系列书籍主要阐述了陈嘉庚与《南洋商报》之间的关系，分析了其创办《南洋商报》的历程以及《南洋商报》所报道的内容如中国军队抗日的情况、宣传抗日救亡的号召等，并鲜明地指出《南洋商报》具有强烈的抗日思想。同时，还解析了在日本侵华战争的过程中，陈嘉庚动员东南亚华侨募捐抗日的过程以及南侨总会的运行状况。

3. 1941年井出季和太撰写了《南洋与华侨》，其在该书中分析了同为福建籍华侨领袖的陈嘉庚和胡文虎之间的商业竞争和各种矛盾，尤其是陈嘉庚的《南洋商报》与胡文虎的《星洲日报》之间激烈的竞争，进而论述了虽然陈嘉庚与胡文虎是商业劲敌，但是在抗日救国的思想和行动上是不谋而合的观点。

4. 1942年，根岸佶出版了其知名论著《华侨杂记》。根岸佶是“日本学术界系统研究华侨帮派组织的第一人，他写的《华侨杂记》一书，对战后日本学者研究华侨社会经济发生过很大的影响”<sup>[13]</sup>。该书是早期论述陈嘉庚较为详细的论著，在书中各处均有陈嘉庚事迹的记述，还另辟

一小节以“陈嘉庚”为题深入解析陈嘉庚，较为详实地论述了陈嘉庚的社会、经济、政治活动。（1）该书阐述了陈嘉庚的经济状况。从马来亚的工业总体框架下分析了陈嘉庚经营橡胶公司的历史变迁，尤其在详细分析后得出：由于华侨橡胶业的衰微和当时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陈嘉庚的企业于1933年进行清算，其名义上的财产已经变得很少了。但是由于在企业发展的高峰期，陈嘉庚参与了大量的社会捐献、政治活动，其依然在华侨群体中享有十分崇高的声望。（2）该书分析了陈嘉庚的抗日活动。在该书的《华侨与时局》这一章节中，作者指出：在新加坡经济上最有影响力的领导是陈嘉庚和胡文虎，但是在社会声望上陈嘉庚要较胡文虎更高，特别是作为抵制日货、坚决抗日的领导人其名气更响。然而，随着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奔赴重庆等地进行实地走访，发现重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抗日消极化后，陈嘉庚脱离援蒋抗日的阵营，转向援共抗日。（3）该书解析了陈嘉庚对教育事业的贡献。从集美小学的建立运营到集美学村的整体建设，从新加坡华侨中学的筹办到厦门大学的创设，陈嘉庚都殚精竭虑、倾尽钱财。不难看出，根岸佶对于陈嘉庚的关注非同寻常，阐释非常详细。

二战结束前，日本学界对陈嘉庚的研究，主要基于其“南进政策”的侵略殖民目的，大多在阐释东南亚华侨群体时深入分析陈嘉庚的社会活动、政治动向和经济实力，尤其对陈嘉庚的抗日活动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解析和探究。其中关于《华侨之研究》这一论著，陈嘉庚的《南侨回忆录》中的“战后补辑”就如此评价：“星洲沦陷后笔者经华侨检证之浩劫，幸得脱险。当时甚欲知日寇对华侨之意见，一日于一小摊购得日文旧书一册，书名《华侨之研究》系日本企划院——按此想系日本政府所设，专为计划侵略他国之机关——所编，一九三九未出版，洋洋巨帙，详述南洋华侨之种种情形，以及其抗日工作，事事皆甚明晰，较之华文书报所自述者尤详。日寇大约即用此种报告为根据，以对付我华侨者，阅之不禁毛竖。中有一段专论陈嘉庚先生，可见日寇对于嘉庚先生之注意，先生能安然渡过此长期逃亡之难关，可谓天幸”<sup>[14]</sup>。显然，无论是日本

企划院、“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等组织机构的研究分析,还是井出季和太、根岸佶等学者的个人论述,从其研究的范式、内容到实质,乃至使用的语言表达方式,均可以看出二战结束前日本的陈嘉庚研究是为日本军国主义和殖民侵略主义服务的。

## (二) 二战结束后日本学界的陈嘉庚研究

二战结束后,日本学界对陈嘉庚的研究摆脱了战时军国主义思想的束缚,以更为客观的研究视角来解析陈嘉庚的人物形像。战后日本学界对东南亚的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出现高潮。当时,日本以“经济合作”为幌子,加紧向东南亚经济渗透,与东南亚的经济关系日趋密切,使东南亚逐渐成为日本对外贸易、投资的重要场所,在这样的形势下,对东南亚的研究日渐受到青睐,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便成为日本学界关注的重点。作为了解和研究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的一个重要部分,陈嘉庚研究也重新获得日本学术界、政府部门和经济团体的重视。二战结束后日本学界的“陈嘉庚镜像”随着历史语境的发展有了很大的转变,比较典型的研究成果有:市川健二郎的论文《陈嘉庚与华侨政治捐款》<sup>[15]</sup>,华裔学者游仲勋的论著《东南亚的华侨》(中文版书名为《东南亚经济简论》)<sup>[16]</sup>,学者须山卓、日比野丈夫、藏居良造等合著的《华侨》<sup>[17]</sup>,市川信爱教授的论著《华侨社会经济论序说》<sup>[18]</sup>,筑波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科松野友美的博士论文《华侨陈嘉庚与国民政府期的国家建设(1923—1942)》<sup>[19]</sup>等。

1. 1968年,学者市川健二郎发表《陈嘉庚与华侨政治捐款》一文,该文从华侨的政治捐款入手,分析了陈嘉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捐款史实,并以陈嘉庚作为华侨典型的个案分析了20世纪初海外华侨对于自己的故土、祖国做出贡献的方式和途径。(1)解析在孙中山募集革命运动资金时期陈嘉庚乃至东南亚华侨的反应和行动。(2)论述陈嘉庚在抗日战争时期成立南侨总会并担任主席、号召东南亚华侨积极募捐的过程,以及率领华侨慰问团到达重庆、延安等地进行慰问、激励抗战将士。(3)统计在陈嘉庚的领导下南侨总会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捐款总额。(4)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嘉庚担任政

协常委会、侨务委员会、归侨联合会等机构要职,积极推动海外华侨对中国国内建设的捐款、教育事业的资助,同时呼吁积极保护海外华侨的经济利益、投资权益,并促进相关法规的出台。作者指出,陈嘉庚对中国国内的捐款初始于其对家乡社会的建设和开发,在抗日战争时期其为国家捐款的积极性达到最高潮,战后陈嘉庚的捐款则体现了其爱国精神与爱乡精神是一体的,是紧密联系在一起。显然,这一观点较为客观,符合历史史实。

2. 1970年,华裔学者游仲勋发表论著《东南亚的华侨》。在该论著中,游仲勋教授在分析东南亚华侨经济时,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以华侨财团的实例谈及了陈嘉庚所从事的行业,其论述道:“橡胶大王陈嘉庚是橡胶、橡胶制品、药品、鞋、饼干、砖瓦、水泥等各种行业企业相结合的华侨财团”,同时阐释了陈嘉庚的企业经营在20世纪30年代遭受世界经济大恐慌时所受的打击,企业内6000名工人失业的状况,还解析了陈嘉庚的女婿李光前在“新马地区后陈嘉庚时期”所掌控的财团、运营的公司的经济活动。该论著主要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来分析陈嘉庚的经济实力、企业运营特点。

3. 1974年,学者须山卓、日比野丈夫、藏居良造等合著的《华侨》出版并发行,得到了学界的好评。该书以《福建帮与陈嘉庚》为题的一个小章节详细阐释了陈嘉庚的历史影响。(1)从宏观的视角出发,分析了福建帮在东南亚尤其在新加坡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陈嘉庚是新加坡福建帮的代表性人物,其大力发展橡胶工业,虽在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遭受毁灭性的打击,但其总结经验教训,从橡胶业这一单一经营扩展到多业种经营,并在多业种的综合经营中获得成功。(2)从个人性格、思想的角度,论述了陈嘉庚是位思想先进、乐观进取的人物。其在20世纪初便加入了中国革命同盟会,在“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与抗日救国的捐款活动,在卢沟桥事变后组织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并担任会长,发动捐款、抵制日货,改变立场支援中国共产党抗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嘉庚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华



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等职位，致力于华侨工作、华侨的祖国捐款等事业。陈嘉庚逝世后其女婿李光前继续积极地协助中国政府的华侨工作。(3) 从教育贡献的角度出发，阐述了陈嘉庚胸怀家乡建设、在家乡无私捐款创设各类学校，以厦门大学尤为盛名。在其教育思想的影响下，其族弟陈六使也成为创立新加坡南洋大学的核心人物。总而言之，该书从经济、政治、教育3个层面阐释陈嘉庚的历史影响。

4. 1987年，市川信爱教授发表了《华侨社会经济论序说》一书，该书主要阐述了陈嘉庚对教育事业的贡献。从1894年陈嘉庚在其家乡集美捐资创立私塾“惕斋学堂”，到后来陈嘉庚创立了集美学校，形成了幼儿园、小学、中学、师范学校、航海学校、商科学校等一体化教学体系，乃至陈嘉庚在1924年至1932年期间支援同安教育委员会设立教育普及部门，并支援创设小学70余所、中学2所。从集美学校的学生人数、学校规模，到其教学特点、学科特色、师资力量；从陈嘉庚投资建设厦门大学的规模由最初的师范、商科2个专业，到后来的文、理、法、商、教等5个专业扩展到9个专业等方面均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论述。在该论著中，主要从经济学与教育学的相互关系来解析陈嘉庚对祖国、故土教育的贡献。

5. 2017年，筑波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科松野友美发表博士论文《华侨陈嘉庚与国民政府期的国家建设（1923—1942）》<sup>[19]</sup>。该论文立足于客观史料，对陈嘉庚与国民党之间的矛盾、冲突进行详细的阐述，包括：（1）在集美学村的运营层面。集美学校的一部分学生加入国民党，联合国民党势力，在学校运营中产生纠纷。陈嘉庚居于自身的学校管理权，利用本地军事势力来维持学校的治安。（2）在福建省地域性势力关系层面。1932年广东系军事势力的国民党十九路军入闽后，对与陈嘉庚关系密切的本地军事势力进行讨伐，因此陈嘉庚不赞成由国民党十九路军组建的革命政府的成立。（3）在侨务政策层面。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侨务政策极大削减了经营移民出国运输的林秉祥轮船公司，而陈嘉庚女婿便是该公司的重要管理者，可以看出国民党政府的侨务政策与陈嘉庚的利益是有冲突的。（4）

在关税减免待遇层面。当时新加坡橡胶价格暴跌，陈嘉庚寻求国民党政府给予免除关税，却被拒绝，因此对国民党政府抱有不满意。（5）在教育事业运营层面。陈嘉庚在厦门大学国有化后的运营中与国民党政府产生分歧，在南洋师范学校的创设过程中与国民党政府产生裂隙。居于这5点分析，作者认为：在1940年的重庆、延安之行以前，陈嘉庚就与国民党之间存在各种矛盾、冲突，而重庆、延安之行，陈嘉庚意识到国民党的腐败、共产党的实干，这一点加速了其支持共产党的行为转变，但并不是其转向支持共产党的唯一缘由。作者从不同历史时期陈嘉庚的社会网络关系出发，解析了陈嘉庚对国共两党态度转变的历史因素，较为客观。

二战结束后，日本学界的陈嘉庚研究逐步冲破军国主义思想的藩篱，研究呈现客观性和详实性，具有其自身的典型特点，形成了与二战结束前不同的“陈嘉庚镜像”。

### 三、日本学界“陈嘉庚镜像”的研究特点

日本学界基于自身的立场和研究视域，从东南亚华侨华人的研究入手，逐步涉及陈嘉庚研究，并对陈嘉庚研究外延的拓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故其在陈嘉庚研究上具有自身的特点，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日本“陈嘉庚镜像”。

1. 陈嘉庚研究在日本学界的出现主要起源于日本对东南亚华侨华人的调查研究。日本对东南亚华侨华人的研究大概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主要是由于当时日本侵占中国政策和“占领、殖民东南亚地区以及南洋诸岛屿”的“南进策略”的需要。该时期日本开始着手对东南亚华侨华人的整体性、一般性的调查研究，尤其是对东南亚地区的华侨人数、华侨分布、华侨关系、华侨经济、华侨领袖、华侨组织等概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研究。而作为在东南亚华侨社会中影响力逐渐增大的陈嘉庚便成为当时日本学界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特别是陈嘉庚在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实力、经营事业、从事的社会行为、政治活动均成为日本学界该时期关注和研究的重点。

2. 日本学界在一战至二战期间的陈嘉庚研究,大多属于一般性介绍、基础调查资料,研究报告一类的成果占有较大份量,部分成果在搜集各类资料上下了很大功夫,论述比较详尽,资料相对丰富,客观上为后来的研究者留下了可供参考或佐证的有用资料,其内容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1)对陈嘉庚经营的行业类型、公司规模、经济实力、运营状况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尤其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对陈嘉庚企业的冲击和影响方面进行了分析和阐释。(2)对陈嘉庚在东南亚的经济影响力、政治影响力进行了分析,解析了陈嘉庚在东南亚华侨进行抗日救国运动中的行为、作用和影响。在这一时期,日本学界对陈嘉庚的关注点集中在这两个层面主要是基于日本向外扩张的需求,尤其是对东南亚扩张的需要。当时正值日本向外侵略扩张时期,对东南亚华侨的调查研究,尤其是对像陈嘉庚这样具有广泛华侨社会影响力的华侨领袖的研究,是符合当时日本国内外政治形势的需要,为其侵略中国、东南亚的战争策略的规划和实施提供情报资料。

3. 在一战至二战期间,日本学界关于陈嘉庚的研究缺乏全面性和客观性,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1)将陈嘉庚列为东南亚华侨抗日群体的精英分子,对其调查和研究更偏重在其如何通过经济影响力来进行排日抗日活动。(2)主要对陈嘉庚的橡胶园、饼干工厂、菠萝工厂的运行状况进行分析,解析其企业破产是由于被日本产品竞争所致,论述其抵制日货的经济原因,具有一定的片面性。(3)在对陈嘉庚的经济状况、社会活动等方面进行论述的时候,往往带有浓厚的敌意,对其进行诋毁。究其原因,主要有:出于国家战争策略等政治目的,该时期对陈嘉庚的研究主要是由日本学者奔赴东南亚进行实地调查和分析,对陈嘉庚进行调查的相关资料比较粗糙,对陈嘉庚的研究也较为粗浅,缺乏全面性;作为当时东南亚华侨领袖的陈嘉庚是南洋抗日救亡组织南侨总会的主席,其大力宣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坚决组织支援抗日救国运动,因此被日本帝国主义视为其对东南亚侵略的一大障碍,是日本帝国主义所敌视的对象,故该时期日本学界对陈嘉庚的分析和评价带有一定的偏见,对陈嘉

庚的调查和研究均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缺乏学术的客观性。

4. 二战后日本学界对陈嘉庚的研究,较以往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观。由于二战结束前日本学界对东南亚华侨进行研究时,局部涉及陈嘉庚的调查和研究,而且偏重于实地调查,因此对其研究和分析缺乏研究材料的全面性,再加上其研究的政治性较强且主要以日本侵略战争的需求为目的,因此有强烈的主观性。二战结束后,其研究的政治性偏向逐步消失,日本学界对“东南亚经济合作”的研究兴趣日益高涨,对东南亚华侨群体的研究也随之兴起。对于战后该领域的研究,日本知名学者游仲勋教授经过长期分析和研究归纳出“三个视角论”的思维视野和研究方法论,即“世界华侨华人经济不仅是经济学乃至经营学的研究,而且必定涉及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应该从中国关系的视角、华人居留国内部的视角、全球化的视角等三个视角,体现华侨华人研究的一般化、特殊化、个别化”<sup>[20]</sup>。战后日本学界的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相较于战前、战时有了很大的改观。因此,该时期日本学界对华侨领袖陈嘉庚的研究显得更具有学术性。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如冈本隆三的论著《华侨集团》、须山卓的论著《华侨》、日比野丈夫的论文《陈嘉庚的一生》、市川健二郎的论文《陈嘉庚与华侨政治捐款》等大多立足于具体的史实,同时结合相关的历史文献,比如陈嘉庚撰写的《南侨回忆录》、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会议记录、《南洋商报》的报道等进行分析,从陈嘉庚的经济状况到政治活动、教育思想等均进行了详实的论述。可见,二战后日本学界的陈嘉庚研究成果逐步形成了一定的系统性和综合性。

5. 无论是二战结束前还是结束后,日本学界对陈嘉庚的研究大多是在研究东南亚华侨的时候涉及陈嘉庚,研究的内容大多从经济层面、政治层面、教育层面来解析陈嘉庚的人物形像。在经济层面,主要论述陈嘉庚在新加坡从事菠萝业、橡胶业等产业的经营状况,如企业规模、员工人数、橡胶产量等,以及经历各种困境后的经济情况;在政治层面,主要分析陈嘉庚在新加坡乃至东南亚地区的社会活动,尤其是在抗日运

动、抵制日货、支援中国国内抗日等方面的分析较为详细；在教育层面，主要阐述陈嘉庚在新加坡地区捐资助学、解决师资难问题，在中国创立集美学校、厦门大学以及支援闽南地区的教育普及的历史功绩。日本学界对陈嘉庚的研究更多的是将其作为东南亚华侨领袖的典型个案进行分析，将其作为东南亚华侨精英的杰出代表进行研究。从时间的纵向角度观之，陈嘉庚研究在日本学界的内涵越来越详实，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在不断拓展，是陈嘉庚研究的外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6. 二战结束后日本学界关于“陈嘉庚镜像”的探析与二战结束前相比有了较大的转变，主要原因在于历史语境的变迁。从二战结束前的历史语境观之，日本学界的陈嘉庚研究首先是基于政治因素，其次才是经济因素。首先，由于日本政府推行“南进”“大东亚共荣圈”等侵略扩张政策的需要，十分重视东南亚华侨的存在，而作为东南亚华侨领袖之一的陈嘉庚自然成为其关注的重点；其次，由于日本在东南亚势力的扩张，其商业贸易活动受到华侨经济力量的激烈竞争和制约，于是日本朝野更加关注华侨的政治动向和经济实力，作为东南亚华侨的经济领袖陈嘉庚便成为日本政府和学界研究的重要指向。从二战结束后的历史语境观之，侵略殖民的政治因素逐渐消失，经济因素便成为主要导向。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后，日本学界出现了东南亚研究的热潮。该时期日本标榜“经济合作”，强化与东南亚进行紧密的“经济协作”，加强对东南亚经济的渗透，试图让东南亚逐步成为日本对外贸易、投资的重要区域。因而掌控东南亚经济命脉的华侨经济领袖便成为其研究的重要内容，作为东南亚经济领袖之一的陈嘉庚便理所当然成为日本学界研究的重点所在。因此，在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等不同历史语境的影响下，日本学界的“陈嘉庚镜像”凸显出与中国学界的差异，成为海外陈嘉庚研究的重要补充。

#### 四、日本学界“陈嘉庚镜像”的研究意义

陈嘉庚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杰出人物，

尤其是作为无私奉献于中国革命、建设的华侨领袖，一直被中国国内学界所关注，陈嘉庚研究的相关成果也不断涌现。而作为亚洲乃至世界范畴的陈嘉庚研究，不只是局限于其出生地中国学界的探索，还应从不同国家或地域的学界研究来阐释陈嘉庚研究的全貌。日本学界的研究便是对陈嘉庚研究内涵的一大补充，形成了日本特有的“陈嘉庚镜像”，具有特别的学术意义。

1. 拓宽了陈嘉庚研究的学术外延。陈嘉庚研究大多集中在中国学界，主要涉及陈嘉庚捐资兴学、支援抗战、建设新中国等历史事实上，大多数中国学界的论文对陈嘉庚进行正面的赞颂。对于伟人的历史功绩进行正面、积极的阐述是值得肯定的，这也几乎形成了中国学界陈嘉庚研究的基本模式。但是，还是出现了“忽视基本的历史事实、片面追求‘歌功颂德式’撰写的所谓‘研究’”之个别现象。纵观日本学界对陈嘉庚的研究，二战结束前注重于田野的实地调查，二战结束后践行历史文献的解析和探索，从不同研究视域的立场出发，突破了中国学界关于陈嘉庚研究的传统范式，将陈嘉庚研究的广度进一步拓展。

2. 呈现了日本学界陈嘉庚研究的价值取向的变化。同一研究对象，在不同研究者、不同研究时期的各种因素差异下，其研究的价值取向也是不尽相同的。日本学界对于陈嘉庚的研究亦是如此。二战结束前，日本学界对陈嘉庚的研究大多源于日本对东南亚华侨华人的关注，该时期日本学界也主要基于日本向外侵略扩张的需求，坚决抗日的陈嘉庚成为研究的重要对象，因此，该时期日本学界对陈嘉庚的论述、评价具有特殊的政治目的和战争需求，虽有一定的客观性，但是更多具有主观性、片面性、故意性和诋毁性。这些特点也成为二战结束前日本学界陈嘉庚研究的主要内涵。二战结束后，随着战争的结束，中日两国对立的缓和，日本学界对于陈嘉庚的研究脱离了战时的学术管制和束缚，更趋于合理和客观。再者，通过分析中国学界和日本学界陈嘉庚研究的异同，可以揭示中国学界与日本学界陈嘉庚研究的价值取向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

3. 展示了陈嘉庚研究在不同学界的不同学术认知。“陈嘉庚作为海外华侨尤其是东南亚华



侨的杰出代表,其亦是伟大的爱国华侨领袖、知名实业家、著名的教育事业家和社会活动家,在世界华侨史和亚洲近现代史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sup>[21]</sup>。不同国家或地区对陈嘉庚研究的不同认知主要源于陈嘉庚所处的历史语境。陈嘉庚生活于中国历史发生巨变的时代,经历满清王朝的没落、国民党政府的兴衰、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等不同历史时期。同时,作为东南亚的华侨领袖,陈嘉庚见证了东南亚地区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东南亚民族独立运动的蓬勃发展。在这一特殊的历史语境下,不同地域的学界居于本地域的政治立场和状况对陈嘉庚的解读也不尽相同。从地域研究的范畴观之,除了中国国内以外,其他地域的陈嘉庚研究就研究的内涵、规模而言,比较有深度的地域学界乃属日本。日本学界立足于其二战前后不同的历史环境、政治因素,对陈嘉庚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和阐释。因此,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日本学界陈嘉庚研究特点的分析,可以解析“陈嘉庚镜像”在近现代日本的评价和认知。

4. 建构了中日学界在陈嘉庚研究上的学术交流和对话。在陈嘉庚研究的学术建构上,二战结束前中日学界均站在各自的价值取向和学术视域上对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和探讨。中国学界一般对陈嘉庚作为华侨领袖在东南亚的影响,在中国大陆的捐资兴学、支援抗战、政治活动进行正面阐述,而日本学界则深受军国主义思想和“南进政策”的侵略思想所束缚,主要对陈嘉庚在东南亚华侨群体中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进行分析,阐述陈嘉庚利用其影响力进行的抗日活动和捐资助学活动,以期为日本政府在东南亚的华侨政策中提供相关情报。二战结束后,随着日本海外侵略扩张的止步,日本学界逐步摆脱侵略思想的影响,在陈嘉庚研究上的客观性和学术性也逐步显现出来,与中国学界的交流也渐渐形成。上述日本学者市川健二郎、游仲勋、须山卓、日比野丈夫、藏居良造、市川信爱、松野友美等人在其论文、论著中多次参考并引用中国学界的学术成果,便是重要的佐证。也就是说,在陈嘉庚研究上,中日学界从二战结束前研究取向上的对立,逐步过渡到学术上真正的交流和对话。

5. 充实了陈嘉庚研究的系统性。通过日本

学界的陈嘉庚研究,可以阐述日本学界关于“陈嘉庚镜像”的历史变化,剖析日本学界陈嘉庚研究的状况和特点乃至历史变迁的缘由,进而对中日学界陈嘉庚研究的特征及价值取向进行横向的比较分析,从而进一步拓展中日学界陈嘉庚研究的内涵和外延。通过这一系列的研究和分析,深入充实“陈嘉庚镜像”研究的丰富性和完整性。与此同时,通过分析中国学界和日本学界陈嘉庚研究的特点,解析此两者的异同点,剖析中日学界研究的价值取向,拓展研究的视野,建构出陈嘉庚研究的整体性和系统性。

## 五、结 语

日本学界的陈嘉庚研究发轫于日本对东南亚华侨的调查和研究,作为该时期东南亚华侨社会的重要领袖的陈嘉庚自然而然便成为日本学界的研究对象。由于受到战时军国主义的影响,日本学界早期的陈嘉庚研究具有鲜明的政治目的性和主观偏见性。随着二战的结束和军国主义思想藩篱的瓦解,日本学界的陈嘉庚研究逐步进入较为客观、较为系统的研究路径,同时也形成了陈嘉庚研究的“日本镜像”,丰富了陈嘉庚研究的内涵。因此,日本学界的陈嘉庚研究不仅为中国学界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照,而且也是对陈嘉庚研究学术内涵的一大补充,拓展了陈嘉庚研究的学术外延。

### [参考文献]

- [1] 杨国楨. 陈嘉庚[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2] 陈碧笙,陈毅明. 陈嘉庚年谱[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
- [3] 林少川. 陈嘉庚与南侨技工[M].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
- [4] 林德时. 论嘉庚精神的基本内涵[J]. 江西社会科学,2020(6):56-59.
- [5] 林德时. 嘉庚精神: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宝贵资源[J]. 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13-17.
- [6] 郭玉聪. 教育救国:陈嘉庚倾资兴学的思想动机[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78-82.

- [7] 潘懋元. 教育事业家陈嘉庚教育思想新探 [J]. 中国高教研究, 2007 (10): 7-8.
- [8] 纪宗安, 崔丕. 日本对南洋华侨的调查及其影响 [M] // 崔丕, 姚玉民. 日本对南洋华侨调查资料选编 (1925—1945): 第1辑.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1-5.
- [9] 日本企画院, 编. 華僑の研究 [M]. 東京: 松山房出版社, 1939.
- [10] “滿鉄東亜經濟調查局”, 編. 南洋華僑叢書 [M]. 東京: “滿鉄東亜經濟調查局”, 1941.
- [11] 井出季和太. 南洋と華僑 [M]. 東京: 三省堂株式外社, 1941.
- [12] 根岸佑. 華僑雜記 [M]. 東京: 朝日新聞社, 1942.
- [13] 郭梁. 日本人论陈嘉庚 [J]. 南洋问题, 1985 (1): 36-44.
- [14] 陈嘉庚. 南侨回忆录 [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4: 376-377.
- [15] 市川健二郎. 陳嘉庚と華僑政治献金 [J]. 東洋學報, 1968 (51-02): 163-189.
- [16] 游仲勳. 东南亚华侨经济简论 [M]. 郭梁, 刘晓明, 译.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7.
- [17] 须山卓, 日比野丈夫, 藏居良造. 華僑 [M]. 東京: 日本放送出版協會, 1974.
- [18] 市川信愛. 華僑社会經濟論序說 [M]. 福岡: 九州大学出版社, 1987.
- [19] 松野友美. 華僑陳嘉庚と民国政府期の国家建設 (1923—1942) [D]. 筑波: 筑波大学, 2017.
- [20] 游仲勳. 現代世界華人經濟論の構造: 研究領域と分析視角 [J]. 地域經濟政策研究, 2004 (4-5): 17-34.
- [21] 任江辉. 中国学界陈嘉庚研究的现状、特点与展望: 以期刊论文为中心 [J]. 皖西学院学报, 2020 (3): 110-115.

## An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of “the Mirror Image of Tan Kah Kee” by Japanese Academic Circles

REN Jiang-hu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The research about Tan Kah Kee in Japanese academic circles started with the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academic research position and militarism, the early research of Tan Kah Kee was obviously subjective and political. However, with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t gradually became more objective and systematic, forming “the mirror image of Tan Kah Kee”, which has its own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Therefore, it has uniqu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academic value for the academic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the overall research about Tan Kah Kee.

**Key words:** the research of Tan Kah Kee; the mirror image of Tan Kah Kee; Japanese academic circles

(责任编辑 冯庆福)